

●如是我读

最想要的归宿

周春梅

多年前的一个秋日,我曾专程前往上海鲁迅公园——原来的虹口公园,拜谒先生的墓地。踏进公园大门,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:晨练的人们在空地上划出轻盈的弧线;树荫下,退休的老人们围坐对弈,时不时传来清脆的落子声;孩童们追逐嬉笑的笑声回荡在林间小径。这热闹的场景,与我想象中庄严肃穆的名人纪念地相去甚远。

作家迟子建在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——怀念鲁迅先生》一文中,记述自己于2017年访鲁迅墓的所见所感,跟我颇为相近:“鲁迅墓前并不安静,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,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,互为拳脚;另一侧是三位大妈,在热聊什么。”迟子建感慨道:“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,纵有绿树青草点缀,春花秋月相映,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,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享有的宁静清寂,

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。”

近日重读先生的七条遗嘱,却忽有所悟,也许,这样的情景,正符合先生的期待。那篇写于1936年9月的《死》中,先生以特有的犀利与透彻留下嘱托:“二、赶快收殓,埋掉,拉倒。三、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。四、忘记我,管自己的生活。倘不,那就真是糊涂虫。”

这些文字如闪电般照亮了我的迷思。鲁迅在《墓碣文》中曾写道:“待我成尘时,你将见我的微笑。”这种超脱于身后名利的境界,与传统文化中对“青史留名”的执着形成鲜明对比。试想,如果先生知道后人因他的墓地而拘谨不安,不能自在享受绿树青草、春花秋月,必定会紧锁眉头,认为这违背了他的本意。

公园里人们自在地锻炼,闲聊,恰是对“忘记我,管自己的生活”这一遗嘱最生动的践行。鲁迅始终关注的是活人的世界,是民族的新

生。他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坦言:“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,却也并不愤懑,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,看见自己了: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。”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,决定了他对身后事的态度——决不要成为压在后人肩上的重负。

传统的纪念方式,如保持安静,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敬意,但对于鲁迅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,或许有另一种更契合其精神的纪念方式。鲁迅一生反对虚文礼节,痛恨“做戏的虚无党”,呼吁人们关注现实,自立自强。公园里人们“管自己的生活”的生机勃勃的景象,恰恰是鲁迅所期望的“新生活”的缩影。因此,这种“视

若无睹”的平常心,或许才是对这位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战士最崇高的致敬:他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一个自然的存在,而非一个被隔离供奉的符号。

记得当年离开公园时,夕阳正好。墓前的空地上,一群孩子正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,欢笑声在暮色中回荡。如今想来,如果先生地下有知,定会嘴角泛起一丝难得的微笑。这种“不妄宁”的安息,或许正是他最想要的归宿——不是被隔离在寂静中接受膜拜,而是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真实生活。

最好的纪念,有时恰恰是“忘却”。



欲辨已忘言 徐群

公元8年,王莽称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。王莽特别热衷于妄改地名,导致天下地名系统混乱,遭到世人的非议和历史的嘲笑。

新朝地方政区仍采用郡县二级制,但许多郡县多次变换,改变极大。顾颉刚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记载:“诸郡县罢置更易,靡有定规,即当时之吏民已痛感其繁琐,不能复记其名称。《莽传》(即《汉书·王莽传》)中言其时郡之改易,岁有变更,一郡且有五易其名而还复其故者,可谓极复杂之能事矣;……往往有诸郡属县互易,县已尽,郡已废尚不知……

王莽妄改地名,源于“对着干”思维,用反义词标新立异以示高明。例如把上党郡的谷远县更名为谷近县,把太原郡的于离县更名为于合县,把陈留郡的东昏县更名为东明县,把辽东郡的辽阳县更名为辽阴县,等等。

王莽更改地名,对边疆地区选用贬斥性字词,例如厌戎(西汉陇西,以下括号内皆西汉郡名)、威戎(北地)、填戎(天水)、填夷(琅玕)、填蛮(长沙国)、获降(五原)、受降(云中)、得降(定襄)、填狄(雁门)、厌狄(代郡)等。这里的“填”即“镇”,“厌”即“压”,皆属轻蔑、敌视、镇压的用语,自然引起边地居民的憎恨与反抗。

王莽妄改地名的闹剧

谭汝为

张伯苓校长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,历来注重广纳优秀教员。因此南开女中也拥有一支学识渊博的教师队伍。即使是抗战时期被迫南迁,重新组合的重庆南开中学依然吸引了许多从天津、北京来的教师。他们在战火中秉承教育救国的理念,为孜孜以求的学生传道授业。

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回忆道:“每天早上升旗典礼,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。在战火延烧的岁月,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,坚毅、勤勉,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,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,就像张伯苓校长说的:‘你不戴校徽出去,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。’”

博学敬业的老师

崔涛

齐邦媛对她的科任老师记忆犹新。“津南村是我所见过的最早的眷村。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,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。如: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,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。还有喻传鉴主任的两位女儿,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:‘大喻’教英文,‘小喻’教理科。”

“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。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。”“他

的课更是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,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:在家乡,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、杏时,往往偷来母亲、姐姐的铅粉抹在梅、杏上,梅、杏就由酸变甜了。”

齐邦媛在书里着墨最多的当数国文教师孟志荪。“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,在我们眼中,已经很老了。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,既不漂亮。也不潇洒(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

装);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,但当他开始讲课。立刻引人全神贯注。他的语言不是溪水,是江河,内容滔滔深广,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。”

结合自家抗战时期奔波迁徙的流亡经历,齐邦媛写道:“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,竟声泪俱下。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,久久难消。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,如醉如痴地背诵、欣赏所有作品,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。”

文章巧中舒己意

杨建民

苏轼的文章,常常在“巧”字上用心。他有篇数十字的短稿《马梦得同岁》:“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,少仆八日。是岁生者,无富贵人,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。即吾二人而观之,当推梦得为首。”文章真好,有味更有趣。东坡说马梦得和他同年同月生,不过比他小八天。再说这一年生的人,都不富贵。他和这人是这年生的穷人中穷者。本来,这就够了,可东坡更进一步,说自己和比较起来,他“为首”。“最穷”,东坡说

成“为首”,领头,即其实更穷。词汇不同,有时会产生出特异的阅读效果来。

古代人对世界、人生的认识不易确定时,也自有解释。譬如苏轼有一篇《退之平生多得谤誉》,“退之”即唐代文豪韩愈,其字“退之”。他说据当时知识,一个人的命宫,象征着他的命运。譬如“魔蝎”座,一生易遭毁谤。东坡从韩愈的诗里,推出韩愈该是“魔蝎为身宫”,联想到自己也是相同“魔蝎”,便借着韩愈来说自己。因为两人相同“身宫”,也就

必然“同病”。看似探讨前辈文豪,似乎说不幸,其实也有文章传世的自诩。

在经过不停贬谪流荡之后,对于安定寻常的素朴生活,东坡愈发有强烈需求。他在一篇《人生有定分》小文中,谈到了这种需求和现实不可得的状况:“吾无求于世矣,所须二顷田以足饔粥耳,而所至访问,终不可得。岂吾道方艰难,无适而可耶?抑人生自有定分,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?”“饔粥”即稠粥。当时的农家,几乎全数收入开支,皆出自土地。东坡一大家子要开支,所以须有“二顷”田地。他说自己的这点最基本生活需求,走了很多地方,却不能得到。潜台词应

书人书事

“抗战时期的南开女中”之三

该是,所以不得不为官,靠着俸禄过活,忍受着官职的升、降,不停调遣的遭际,不得安宁生活。

现实、精神两者间撕扯的情形下,开朗的苏轼也不由地发出疑问:是自己的行为选择,让生存如此艰难?还是人生本来就有定数,就算仅仅吃一口饱饭,也和求取功名富贵一样,不容易轻易得到吗?世间事太难料理,想过一种极简朴的生活,以此来求取精神顺畅的状态,也绝不容易获得。该文从实际出发,落脚到问题质疑。在不解与解之间顿结,引人深思。

人文经典

《东坡志林》品读随札之九

微书评

商皓

●郭浩著《国色:中国人的色彩世界》

郭浩似乎更愿意穿越时空,回到历史中,与古人一起见证色彩的命名时刻。他们用日升月落、山脉矿石、鸟兽植物、四季轮回,来描摹自然赋予的诸多色彩,仿佛正在启动某种极致的美学仪式,进而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

●徐风著《江南器物志》

这是一部以文字构建的“江南版《清明上河图》”。本书从科举、稼穡、节庆、风俗、嫁娶、餐饮、庭院、家具、服饰、舟车、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,写民间器物的起

始、传承、流变,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,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。

●钱婧著《新收入》

从主业技能的外延到副业的冷启动,从线下摆摊到经营个人IP,从市场和销售的常识到应对AI时代的变局,作者用25堂商业课的形式讲解了创造新收入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方案。

●[德国]卡特娅·奥斯坎普著《此生未尽》(毕秋晨译)

尽管人到中年,接连遭遇被退稿、被迫转行的危机,卡特娅·奥斯坎普还是愿意为《此生未尽》涂上一层温暖的底色。她知道,我们都曾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颠沛流离,止步不前。如若就此认输,则未免违背了自己最初的志向。